

后迄睿宗共譯經律論凡三百餘卷淨雖翻三藏而偏攻律部
譯綴之暇曲校學徒凡所行事皆尚急護瀝囊滌穢特異常倫

义净译经身体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

○ 谭代龙 著



吉文出版社

义净译经身体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

○ 谭代龙 著



古文出版社

义净译经身体运动概念场
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
谭代龙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76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5.00 元

ISBN 978-7-80241-009-1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汉语历史的研究，词汇的研究滞后于语音、语法的研究；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对演变的解释滞后于对演变的描写：对这样两个滞后学界的同仁早有共识。对汉语词汇演变的描写，在专书和断代词汇研究的重要性为大家认识之后，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好的局面。但到了后来，大家发觉单纯的描写（无论是多么细致的描写）已不符合学术进步的要求，也不能看做是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终极目标，所以关注的目光便愈来愈多地投向了解释（语言运行的路径、方式、制约条件、促动因素等），描写与解释的结合成了大家努力的新方向。



序

由于长期浸淫于传统训诂学的模式之中，当一旦了解还有语义场、义素分析这样一些理论之后，从中看到了词和词、意义和意义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看到一个词的意义还可以做结构成分的分析，可以分类集合起来进行观察，像是又发现了一片新天地，这样在一段时期就成为不少研究者尝试进行解释的重要方法，而且有可喜的成果问世。不过就在这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语义场划分、义素分析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也在不间断地困扰着我们。语义场划分和义素分析的新眼界使我们看到了语言系统的一面；但什么是系统，举一些例子说说可以，要说得完全周详就很难。如果词汇系统是自足的、封闭的、界限分明非此即彼的，事情要好办一些，但种种困扰显示，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我们至今无法对全部的词语作语义场的划分和义素的分析，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词语都像颜色词、军阶词和亲属词那样秩序井然。我们遇到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对系统的描述和对演变机制的揭示。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这个理论给予我们的启迪之一是，如果说词汇有一个系统的话，那么词汇系统并非自主独立的，其背后还潜藏着一个概念系统，这个系统来自于人对外部世界的经验和认知。语言是一个层面，语言的背后还有一个层面。外部世界也许是无序的，但语言反映的是经过人划分后的一个世界，不能设想经过人的认知之网的筛选、加工分配（范畴化）之后依然是无序



的，如果是那样，庞大无比且杂乱堆砌的词语既不能在记忆中储存，也无法在交际时被随时提取（对意义的接收和回应）。显然，如果只是在前一个层面中左冲右突，就难以有所突破，必须进而寻求语言背后的那个系统。这个理论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迪是，如果承认语言是认知的产物，那么演变机制的揭示如果只取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就难以取得深度的解释，所以隐喻、转喻这样潜在的认知路径就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讨。

代龙同志的这项研究是“义净译经身体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义净译经写定于唐初这样一个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时期，作品容量大，反映的生活面广，语言现象（特别是口语成分）丰富，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代龙同志试图追求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理念，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表达人体运动的词语为研究范围，以“概念场词汇系统”作为研究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一种勇于探索的学术勇气。对一种理论的准确介绍自属不易，将此种理论运用于语言的本体研究尤为困难。近年来对认知语言理论的评价已有不少，但鲜见在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中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理论的优劣在于其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力。对一种理论的运用需要对其有深入的理解和与材料的恰当结合。作者在他的这项研究中并非简单地张挂标签，而是以扎实的语料调查为基础，力图透过复杂多变的词汇现象找出背后的基本规律以及促动其演变的认知机制，力求作出贴切合理的解释。其研究的结论固然值得重视，而其对研究新路的探索更具启迪的意义。

同所有理论一样，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待发展和完善（比如对概念结构的理解、解释的覆盖面，意义解释对百科知识的依赖，对描写者直觉的依赖等），所以也不能停留于一味的赞美。语言的研究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诠释某种理论，需要的是在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中对其加以检验并不断有所推进。

在代龙同志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我与他有师生之缘。他有川人的率直耿介，喜怒时形于色，不假外饰；他来自农村，厌恶虚浮，有农家子弟的朴厚笃诚；后来念了大学和研究生，一直对语言学抱有强烈的兴趣，有着学人的坚持执著。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本书出版真是一件可喜的事，相信他今后还会有更好的成果问世。

张联荣

2007年5月20日

目 录



目 录

序	张联荣	1
第一章 绪论		1
1.1 背景和理论		1
1.2 研究目标		18
1.3 研究方法		19
1.4 有关说明		21
第二章 义净及其作品		28
2.1 义净事略		28
2.2 义净的译场和翻译观		29
2.3 义净的作品		32
2.4 义净作品的语料价值		32
2.5 义净作品语言研究综述		46
第三章 义净译经身体非位移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 演变研究		52
3.1 卧睡概念场词汇系统		52
3.2 跌倒概念场词汇系统		71
3.3 蹲坐概念场词汇系统		84
3.4 起立概念场词汇系统		94
第四章 义净译经身体位移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 演变研究		104
4.1 前进概念场词汇系统		104
4.2 却退概念场词汇系统		110



4.3 内入概念场词汇系统	117
4.4 外出概念场词汇系统	126
4.5 到达概念场词汇系统	131
4.6 去往概念场词汇系统	151
4.7 返回概念场词汇系统	170
4.8 来概念场词汇系统	184
4.9 行走概念场词汇系统	190
4.10 旋绕概念场词汇系统	211
4.11 追逐概念场词汇系统	217
4.12 逃亡概念场词汇系统	225
4.13 隐藏概念场词汇系统	234
4.14 等待概念场词汇系统	242
第五章 结语	249
5.1 各概念场词汇及其系统的共时和历时情况	249
5.2 本项研究的理论认识	257
5.3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266
附录	268
1. 义净作品目录	268
2. 敦煌遗书中的义净作品	274
3. 敦煌遗书中的义净资料	281
4. 关于“赴”“造”“诣”	281
参考文献	290
引用文献	296
后记	300



第一章 绪论

本书以唐代高僧义净(635—713)译经为研究语料,以其中指称身体运动概念的相关词汇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获得初唐时期该类词汇的面貌和系统属性,并对反映出来的规律性现象加以理论概括。文章首先描写这类词在义净译经中的分布情况,进而探求各个成员及其系统属性的历史来源和演变历程。在研究中,尝试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相关思想,对该词汇系统的构成和演变情况作深层探索。

下面对本项研究的选题背景和理论、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情况加以说明。

1.1 背景和理论

1.1.1 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学界除在有关词汇事实的描写与分析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之外,还对诸如字与词的关系、词义与概念的关系、词义与语音语法的关系、疑难词语考释与词汇史研究的关系、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关系、个别研究与系统研究的关系、描写与解释的关系、材料与方法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也都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张联荣先生对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工作作了如下概括和评述:

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别词语的考释。第二,词汇发展史的研究。第三,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疑难词语的考释,是传统训诂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历史悠久,成果辉煌。训诂学给我们留下了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有待不断开掘,提炼其精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本世纪以来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特别是专书词汇和断代词汇的研究,给词汇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在做着持续的努力,他们力图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词语考释和



词汇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古汉语词汇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各种词汇现象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张联荣，2000：前言）

站在现代语言学的背景下来看这三个方面，历史词汇学的工作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诚如蒋绍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汉语历史词汇的主体工程是汉语历史词汇学。”（蒋绍愚，2000）就笔者所知，较早对历史词汇学有所讨论的学者有吕叔湘和张永言二位先生。吕叔湘先生认为：“汉语的历史词汇学是比较薄弱的部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力量跟这项工作的繁重程度很不相称。”（吕叔湘，1983）张永言先生认为：“个别语言词汇学又可以分为历史词汇学和描写词汇学。前者研究语言的词汇在历史过程中的发展。后者研究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一般是指现阶段）语言的词汇系统的状况和特点。”（张永言，1982：2）其后，蒋绍愚先生则明确提出了“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的主张，蒋先生认为：

汉语历史词汇学，是对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它无疑是要在吸取我国传统训诂学 and 现代语义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毕竟还不同于训诂学，因为它主要着眼于一些理论性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对具体词语的考释；它也不同于语义学，因为它不是谈一般的语义问题，而是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如果这方面的研究做好了，那么，它一方面会对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描写和研究有帮助，另一方面，也会对语义学的发展做出贡献。（蒋绍愚，1989a：25—26）

另外，蒋先生对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方法、步骤等重要问题也作了深入阐述：

词语考释是词汇研究的基础工作，但不是词汇研究的全部。汉语历史词汇的主体工程是汉语历史词汇学。什么是汉语历史词汇学？它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1. 历史的研究。即各个时期汉语词汇系统的描写以及汉语词汇系统历史演变的研究。2. 理论的研究。即汉语词汇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其他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两部分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规律和理论应该是从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蒋绍愚，2000）

上引诸家对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定义各有侧重，但基本精神一致，



即都强调在事实的深入描写基础之上加强理论研究。无疑,这是汉语历史词汇研究的一条基本道路。

更进一步说,从今天的学术要求来看,无论是个别词语的考释,词汇发展史的研究,还是相关演变规律的探求,对各个时期词汇系统的面貌和属性的研究无疑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系统背景,我们所获得的一切认识,都有可能是片面的。这具体体现在所得认识的信息量有限,对复杂的语言现象缺乏足够的解释力等方面。

因此,我们可以说,词汇的共时系统既是研究工作的根本目标之一,也是研究工作的基本平台。这种思考直接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共时系统语言学思想。

1.1.2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在对语言作出两次选择(语言/言语;历时态/共时态)之后(索绪尔,1982:141),就进入了対共时语言学的理论论述。索绪尔的基本思想就体现在对共时语言学的系列论述中,我们把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索绪尔针对十九世纪历史语言学的“原子主义”倾向,明确提出“语言系统”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P. 37),“语言是一个纯粹价值的系统”(P. 118),“把一项要素简单地看作一定声音和一定概念的结合将是很大的错觉。这样规定会使它脱离它所从属的系统,仿佛从各项要素着手,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可以构成系统”(P. 159),“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P. 127),“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P. 143)。

对此,索振羽先生认为:

索绪尔的“系统学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说,它强调语言的整体性,但这种整体性不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那种机械论的整体性,而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那种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思想确切地揭示了语言系统本身的特性。正是这种思想使20世纪语言学跟19世纪语言学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说: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学说使20世纪语言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索振羽,1994)



吕叔湘先生认为：

近代语言学的更重要的收获是对于一条根本原则的认识——语言的系统性。每个语言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语音、语法、词汇都是如此。（吕叔湘，1983）

索绪尔的这种思想使他成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相对 19 世纪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取向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把语言看作系统，从系统观出发去发现并解释个体的属性和语言中的一切共时和历时现象，已经成为今人的基本共识。

现代语义学在贯彻这种思想上做了很好的工作，其基本的研究思路对汉语历史词汇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1.3 现代语义学又分为结构语义学、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和逻辑—数理语义学等，目前占据主流的仍然是结构语义学。蒋绍愚先生认为：

现代语义学在词义研究方面比传统词汇学有较大的突破，在宏观方面，把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在微观方面，对词义再进行深入的分析。（蒋绍愚，1989：前言）

贾彦德先生认为：

它注意研究句子意义、它使用的义素分析法和它提出的语义场理论，无疑是对传统语义学的重大的突破，在语言学界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和反响。（贾彦德，1999：16）

张志毅、张庆云先生从分析传统语义学的不足来观察现代语义学的优点，他们归纳了传统语义学的四点不足：

第一、它研究的单位是一元的，只局限于词义。

第二、它的研究方向是单向的，只是静态地研究语言中词义纵向的聚合。

第三、它的研究思想，从宏观上说没有把词义视为一个整体系统。

第四、它的研究方法，没有充分运用分析法。

并认为：

（现代语义学）在理论上、方法上，都是对传统语义学的重大突破。它使得传统语义学面对的开放性的、分散性的词汇语义单位变成了封



闭性的、系统性的词汇语义板块。(张志毅、张庆云, 2001: 2—4)

从以上评述可以看出,现代语义学的基本思想是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义素分析法在语义的微观探索上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由于主观性太强而受到不少批评。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词义的认识和把握远远不够,据此得出的分析结果对复杂的语言现象自然也就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语义场理论则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语义场是指义位形成的系统,……如果若干个义位含有相同的表彼此共性的义素和相应的表彼此差异的义素,因而连接在一起,互相规定、互相制约、互相作用,那么这些义位就构成一个语义场。”(贾彦德, 1999: 149)这个定义反映了语义场理论的基本思想,即一个语义场内的义位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规定、互相制约、互相作用”。这实际上是对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系统以及语言符号的“价值”等思想的贯彻,并发展了索绪尔的组合和聚合理论。

把语义场理论引入汉语历史词汇学,明显地推动了研究的进展。由于特有的研究目的,传统训诂学注重考证一个个孤立的疑难词语。这种工作无疑对认识古代语言系统具有重要作用,但还远远不够。传统语义学则主要是“以具体语言的语义研究为基础,吸收语文学时期语义研究的成果逐渐形成的。传统语义学在理论上对一系列问题作了研究和阐明,这些问题是:词义、语音、客观事物三者的关系;词义与概念的关系;词义的色彩;多义词、同音词(同音异义词)、同义词、反义词;词义的演变,特别是演变中的扩大、缩小和转移等等”(贾彦德, 1999: 4)。相比之下,现代语义学的语义场理论则把词义放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中来观察,认为同一个场中的义位之间、场与场之间的关系,就反映了词义的系统属性。古汉语学界对此有过相当深入的论述,例如张永言先生认为:

语言里的词互相结合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语言的词汇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词与词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语义联系,一个词的意义既依赖于它的同义词和跟它属于同一“义类”的别的词,也依赖于在使用中跟它相结合的别的词。(张永言, 1982: 13)

正因为词汇体系里的各个单位在语义上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



所以只要词汇里一有新的成分出现或旧的成分消失，就会导致词义的重新分配。（张永言，1982：13）

在词汇领域里，各个语言单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意义上的联系；我们要把一种语言的词汇当作一个体系来研究，首先就得按照词的语义联系进行分门别类的工作。词的语义分类是词汇研究的实际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张永言，1982：67）

张联荣先生认为：

依照词指称的事物或概念，我们可以把词分成不同的群体。比如食、噉、嚙、啐、啖、餌、咬、啗这些词都和吃有关，它们就是一个群体。每一个群体都占据一块地盘，每一块地盘上都有若干词，这些词在这块地盘上各有自己的位置，这就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从理论上讲，每一种事物、每一种对事物的认识都应当有相应的词表示，这样才能满足人们交流的需要。在这块地盘上，如果一旦有的词被挤出去了，某一处出现了空白，就应当有别的词加以填补。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有的词占的位置扩大了，或者有新的词进入了这块地盘，那么势必有一些词占据的位置就会相应缩小，这就是词义的互相排斥。总之，一些词的变化必然要引起另一些词的相应变化。当一个词的范围扩大时，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的词的范围缩小了；当有的词范围缩小时，我们也要考虑是不是有的词范围扩大了；当有的词发生词义转移时，我们要考虑它原来的位置让谁占去了，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词义的排斥与互补。（张联荣，1997：70）

以上论述都体现了语义场理论的基本思想。语义场理论是现代语义学遵循索绪尔的共时语言系统研究思想而提出的具体的研究思路，极大地推动了结构主义语义学的发展。汉语历史词汇学把语义场理论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看作是一次学术思想的大发展。不少古汉语词汇研究者对此给予了密切关注，并在具体研究中贯彻了这种思想。蒋绍愚先生的《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是这方面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在选题、构思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开风气之先。而后相继完成的一批学位论文（吕东兰，1998；崔宰荣，2001；杜翔，2002；宋新华，2003；张雁，2004；王枫，2004等）也对相关语言事实作了深入研究。

1.1.4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语义场归纳的主观性、随意性比较强。一个义位为什么归入这



个语义场而不归入那个语义场，往往难以说出明确的理由。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工作就难以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不能达到研究的目标。近年来学界对这方面问题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

词汇系统的研究，应该研究词与词在语言系统中的整体联系。而词义之间的联系，并不就是词与词在语言系统中的联系。词义联系仅仅是系统联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在确定词汇系统时，仅有意义联系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形式（语法、语音）方面的联系。而语义场的基本单位——“义位”，还不具备语言符号的地位。^① 所以，仅仅通过义位之间的联系来建立词与词之间的联系，也就难免主观性。因此，根据义位之间的联系来确定词与词在语言系统中的联系，还仅仅是工作的开端，是第一步。

从这些年古汉语研究的状况来看，与汉语历史语音学和历史语法学的研究相比，历史词汇学的研究成绩落在了后面。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对词汇的系统属性认识不够。词汇的系统属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究竟应该从什么角度入手来描写词汇的系统属性？对于这类问题，学界还没有达成多少共识。这种情况导致了不知道怎样研究才好的问题。

其二是由于汉语历史文献相当丰富，词汇总量巨大，情况复杂，涉及的面又非常广，往往难以控制和把握。因此在研究工作中，人们常常感到不知从哪里入手才好。

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对语言研究的要求越来越高，汉语历史词汇学也同样要承担新的任务。诚如董秀芳先生所论：“汉语史研究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对一些变化事实作粗线条的勾勒，而应对隐藏于事实背后的演变的动因、制约演变的条件以及演变所经历的具体渠道等问题做出分析和解释，只有这样，汉语史研究才有可能走向深入、更上一层楼。”（董秀芳，2002：9）尤其让人不满意的是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建设严重滞后，无论是个体研究还是整个研究局面都缺乏系统性。学界没有能够形成一些大的焦点，有

① 目前学界对于“义位”有不同的定义，此处指不具备语音形式的词义单位。



的研究工作缺乏基本的问题意识，新的研究工作不能很快和已有的成果衔接起来而找准自己的位置。诸如此类都是当前汉语历史词汇研究中遇到的大障碍，如果不加以研究解决，必将严重影响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发展。

问题千头万绪，总的来看，学界对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理想、研究程序、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还缺乏自觉而严密的论证，没有打通基本的理论难关。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新的、明确的研究思路。

在这方面，认知语言学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

1.1.5 认知语言学是近二十年来国外语言学界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其产生和快速的发展势头背后有着深刻的学术思想背景。“它广泛吸收了语言学之外研究人类认知活动的各门学科如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人类学及在这些学科基础上产生的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与分析方法，在语言学内部则整合了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路子，基于非客观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哲学观和语言观，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构造，并分析其认知功能基础。其基本主张是：自然语言是概念化的现实的符号表达，句法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自主的，而是有自然的动因（motivation），即其外在形式常常是由认知、功能、语用等句法之外的因素所促动，故表层句法结构直接对应于语义结构；而语义结构并非直接等同于客观的外在世界的结构，而是与人在和客观现实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身体经验、认知策略乃至文化规约等密切相关的概念结构相对应。”（张敏，1998：前言）

认知语言学具有明确的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和非客观主义的认知观。其基本理论有范畴化及其原型理论、隐喻和转喻认知模式、意象图式、句法的象似性等等。张敏先生（1998：4—5）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归纳成九个方面，为便于完整了解其基本思想，特转引如下：

1. 自然语言既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又是认知活动的工具，其结构和功能应视为人类一般认知活动的结果和反映，人类的语言能力不应当作人脑里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和知识的一个完全自主自足的天赋的部分，而应当看作是与一般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的。语言机制应该



是普遍认知机制的一部分,二者应结合在一起研究。同样,句法也并不像生成语法学家所声称的那样是自主的、任意的,而是有动因的(motivated),即往往由语义、认知、功能、语用等句法之外的因素所促动。

2. 句法并不涉及任何转换的部分,表层句法结构是句法描写的基本单位,它直接对应于语义结构。

3. 语义不是基于客观的真值条件,语义结构也不能简单地化解为真值条件的配列,它并非对应于客观的外在世界,而是对应于非客观的投射世界(projected world),并与其中约定俗成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直接相系。概念结构的形成与人的物质经验、认知策略等密切相关。

4. 语义学和语用学形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二者都作用于语言的意义。语言的意义并不限于语言系统内部;而是植根于人类与世界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物质经验,植根于说话人的知识和信仰系统。因此,纯语义的知识和百科知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语义是我们总体概念系统的一个部分,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模块部分(module)。

5. 由于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传达意义,故在形式上所作的区分仅当它们反映语义或语用、话语上的分别时才是可取的。

6. 语言共性及语言里的一般规律往往体现为某种趋势,而不一定是绝对的规则。

7. 对语言规律的形式化或以构造形式化模式作为对语言共性的解释,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解释,而只是描写或模拟(modeling)。对语言共性更有意义的解释往往须在形式之外寻找,如从语义、表达交际功能、认知能力及策略等方面去寻求。

8. 语言里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并不完全是由充分必要条件决定的,一个范畴内部常常包括中心的部分和扩展的边缘部分。因此范畴化的原则既有基于图式(schema)的,也有基于原型(prototype)的。

9. 语法格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与词汇项目一样,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它们有着真实的认知地位,而不是由生成规则或普遍原则的操作所产生的副现象(epiphenomena)。因此,语法与其视为一种规则系统,不如视作一份由形式-意义的结合物构成的具有内在结构的象征符号(symbol)的清单。也就是说,句法不是生成的,词汇项目和语法结构项是连为一体的,其间并无绝对的界线。

这九个方面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思想。

一般认为,从认知语言学创立者的学术思想来源、其所持的基本语言观和研究思路等方面来看,认知语言学是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

尤其是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彼此之间是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典型对垒关系。而随着学术的发展，目前已经逐渐出现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努力和思考。如生成语法学家 Newmeyer 就认为，自主的普遍语法原则是“功能促动、结构表述”，形式结构的研究和功能的研究应是并行不悖的（参看张敏，1998：30）。蒋绍愚先生也指出，“以‘感知—概念’为基础的语言研究不能代替或排斥以‘逻辑—数学’为基础的语言研究。正确的做法是把两者结合起来。”（蒋绍愚，1999）

根据我们的理解，形式的研究和功能的研究都离不开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一切问题的探讨都基于对具体翔实的语言事实的把握之上。二者在研究取向和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上虽颇异其趣，但根本的分歧还是在解释层面上。形式主义语言学认为只能在语言系统层面内部寻找各种语言现象的解释；认知语言学则认为应该在语言系统之外寻求答案，即强调人体的各种经验在人的认知和语言形成中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人的概念结构促动了语言系统属性的形成。

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和语言学的独特理解，对以词义研究为核心工作的汉语历史词汇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其中有些观点可以在广度和深度上开阔我们的视野，而有些论述即使我们不赞同，也不可回避。如认为语义不是基于客观的真值条件，语义结构也不能简单地化解为真值条件的配列，它并非对应于客观的外在世界，而是对应于非客观的投射世界，并与其中约定俗成的概念结构直接联系。这种看法是对现代语义学所采用的义素分析法的一种反动。如果接受这种观点，那么以前的有些词义分析的思路就需要重新检讨。又如认知语言学高度重视多义范畴分析中的隐喻扩展方法，并重新认识隐喻和转喻的意义，对古汉语词义引申的研究就有着重要的价值。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多了起来。它对认知经验中基本范畴概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层次范畴词汇的重要性的论述，与古汉语学界近年来对常用词研究的重视不谋而合。其他如对原型及其扩展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等，都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直接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沈家煊先生在评介 Sweetser, Eve (1990/2002) 时认为：

读完本书，笔者感到在分析语义时，确立多个认知域的语义结构